

天下最好的主编



褚钰泉先生纪念文集

天下最好的主编



褚钰泉先生纪念文集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下最好的主编:褚钰泉先生纪念文集/纪念文集编委会编

—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,2016.4

ISBN 978-7-5568-1601-9

I. ①天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褚钰泉—纪念文集 IV. ①K825.4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51108号

天下最好的主编:褚钰泉先生纪念文集 纪念文集编委会

策 划	张秋林
责任编辑	熊 焱 陈珊珊
美术编辑	徐 泓
出版发行	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\$) 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出 版 人	张秋林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2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26.75
版 次	2016年4月第1版
印 次	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68-1601-9
定 价	45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(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)

服务热线:0791-86512056)

天下最好的主编



思《悦读》 挽钰泉

邵燕祥

初于“书市”识阿昌，
春草青青秋草黄。
书友朋侪情若许，
人生原不计炎凉。

书缘三十有余年，
纵有书缘一面慳。
悟得“悦读”真味永，
一年四季读书天。

幼年即知旧传谐谑童谣：

“春天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炎炎正好眠。
秋又凄凉冬又冷，收拾书包过新年。”
褚钰泉兄大张“悦读”之帜，
惠及同好，启发后来者多多，
功不可没，成俚句相挽。

乙未残腊



褚钰泉先生

生命的绝响

——怀念褚钰泉先生

张秋林

1月13日傍晚时分，我乘车去新五湖大酒店赴一个作者的邀约，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，是褚钰泉先生的弟弟褚孝泉打来的，顿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因为之前他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——果然，他哽咽着告诉我：他的兄长已于1月9日突发心梗去世！……倏然间，如五雷轰顶，震得我目瞪口呆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：马上回去，把自己关在房里，一个人静静地呆着，好好地回想……

当晚十一点我发出微博：“惊悉钰泉仙逝，我顿时泪流满面。钰泉，上个月你编定四十四卷《悦读》，离别之前我们说同一句话：我们都要好好保重！你怎么猝然离我而去呢？你是我三十年至交，你用心血和智慧编出的《悦读》，是我们友谊和合作的见证，也是当下文化坚守的丰碑。”同时还转发了他不久前为我社建社三十周年纪念文集撰写的文章《〈悦读〉四十四卷》。

一夜无眠，悲痛万分。

第二天上班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副总编、《悦读》责任编辑熊炽、美编徐泓叫到办公室来，商量如何安排好纪念钰泉的活动，以寄托我们的哀思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泣不成声。他们的心情也和我一样沉痛。

我们作的第一个决定，就是编辑出版《褚钰泉先生纪念文集》，在他逝世百日追思会上面世。为此又作出一个决定，在《文汇报》连续五天刊登有关纪念文集的征稿启事，同时给《悦读》的部分作者发出征稿函。我想，以这样一种方式纪念褚钰泉，才能表达出我们对这位书界“燃灯者”深深的致敬。

如我们所愿，征稿启事和征稿函一经发出，便迅即得到回馈，并引发强烈反响：《中华读书报》1月20日率先发表汪家明的纪念文章《永不再来的催稿电话》；接着1月25日《文汇读书周报》发表吴中杰的《献身精神与人文风骨——悼褚钰泉弟》，以及毕冰宾的《我们都相信来日方长，但是……》；1月31日《北京青年报》整版发表陈四益的《一代编才的爱与哀愁》；2月5日《新京报》发表韩戍的《一个人、一本书和一个时代的落幕》；2月15日，《湖北社会科学报》发表俞汝捷的《与褚钰泉先生交往杂忆》；2月23日《出版人》发表朱正的《褚钰泉、〈悦读〉和我》；2月25日，《新民晚报》发表陈贤德的《掩卷流泪思钰泉》；3月4日《南方周末》发表陈思和的《怀念褚钰泉》……可见褚钰泉先生的离世，在书界、学界和传媒界引起了多么大的反响。

我和钰泉相识于1986年，那时我刚出任江西少儿社社长不久，他主编的《文汇读书周报》正办得风生水起，是出版社新书宣传的最佳窗口。我们社里每有重点新书，《文汇读书周报》都会率先报道。

我还记得钰泉在他的“阿昌逛书市”里，对我社推出“中学生密友丛书”予以夸赞，说把握了中学生流行文化的热点；在“每周一书”栏目，又重点推介了我社的《巴金和寻找理想的孩子》、“布鲁诺与布茨系列小说”等……由于《文汇读书周报》的鼎力宣传，成立不久的江西少儿出版社在业内便声名大噪。我去上海出差，总会抽时间去报社拜访他，或者约上“书坛三剑客”其他两位，《解放日报》读书版的伊人、《新民晚报·读书乐》的米舒餐叙小酌。钰泉对出道不久的我非常关心，鼓励我一定要抓原创，建立自己的作者队伍。于是我社便与国内新锐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、郑渊洁、高洪波、张之路、梅子涵等人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。现在想来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有今日的辉煌，从他这位“燃灯者”那里真是受益良多。

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，在我因那场“风波”而被解职，一度漂在上海时，他对我的悉心关照和支持。当时我在上海长寿路主持南海书店（南海出版公司在上海的分支机构）工作，钰泉时常来看望我、鼓励我。不久我总编撰的《绘画本二十五史故事精华》（福建少儿社版）出版了，他用《文汇读书周报》的版面大张旗鼓地宣传，还编发我《关于大出版的若干思考·〈大灰狼画报〉的象征意义》等文章，使我在世态炎凉中感受到真正的友谊和温暖。1994年12月，我回到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工作，他马上在《文汇读书周报》上刊发韩沪麟对我的专访《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使者——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副社长张秋林素描》，颇有为我“正名”的意味。

钰泉离开《文汇读书周报》主编岗位而被“休息”后，却不甘寂寞，又办起了杂志书《悦读》。我收到他寄来的《悦读》，顿时眼睛一亮，编得多好的一本读书杂志呀！不料这么好的《悦读》，仅出三期就无端地被叫停了。后来，我们谈起“无疾而终”的《悦

读》，他问我可以出吗？我毫不犹豫说：“当然可以！”虽然《悦读》的读者对象不是少儿，但社名既已改成“二十一世纪”，出书范围自然拓宽了，而且我又有很深的人文情结。于是，2006年，《悦读》正式落户二十一世纪社，以两三个月一卷的节奏，出版至四十四卷。每当《悦读》发稿时，钰泉都会乘高铁来南昌，待上一周，等稿子排定校改后再返沪。他一般是周二晚上八点半左右到，我会安排在食堂与他共进晚餐，约上三二好友同仁喝上几杯，聊一些书界文坛的趣事逸闻。他就住社里十五楼招待所，与我比邻。第二天上班他会准时来我办公室，给我看新一卷的目录，告诉我有哪几篇分量重的特稿，又有哪几篇饶有意味的文章，让我和他一起分享妙文佳作带来的欣悦。在南昌期间我尽量不安排出差，享受与他在一起谈书论道的日子……十年的时光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走过。这十年也正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高速发展的十年，我们站上了世界童书出版之巅；而《悦读》历经十年修为，在书界也立起了令人瞩目的丰碑。可以说，我们共同经历了“黄金时代”。钰泉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，藉《悦读》一方天地，释放他的饱满能量，挥洒他的非凡才华，把“一本关于书的书”做到了极致。如今，钰泉驾鹤而去，《悦读》遂成他生命的绝响！

在组织《褚钰泉先生纪念文集》文稿的过程中，我以为必须有一篇厚重的文章，对四十四卷《悦读》的文化价值作出总体评价，于是特约著名评论家、《悦读》的作者李建军执笔，撰成《折芳馨兮遗所思——褚钰泉的理念与〈悦读〉的风标》。皇皇一篇万言文，《悦读》伟绩有定评。当然，在万千读书人的心中，在著书人和出书人心中，对于“燃灯者”褚钰泉和他主编的《悦读》，也早有定评了。

安息吧，钰泉兄！

《悦读》四十四卷

褚钰泉

桌上放着四十多卷《悦读》，我轻轻地舒了口气：时间过得真快，不知不觉近十年过去了。

我和秋林社长相识快三十年了，当年他的血气方刚曾引起我的共鸣，很快便成了知交。但无论如何没想到后来我会成为他们出版社的“一员”，成为他的“部下”。

还得从我离开《文汇读书周报》说起。我参与创办并主持这份报纸十六年，后来，因为有新的政策——不是中共党员不能主持媒体，就离开了这份报纸，按领导的要求“好好休息”。文汇出版社的社长，觉得我闲在那儿有点浪费，就鼓励我编一本杂志，于是就有了《悦读》。出了三卷，颇得好评。那位要我“好好休息”的领导听到反映后，大为不爽：怎么不“休息”又干起别的事来呢？立即要出版社查一下《悦读》在政治上有无问题，查了半天，没查出什么，但仍不甘心，就以技术上的一些问题，勒令停刊。这位领导的指示自然没人敢违抗。《悦读》就此夭折。

秋林社长闻讯后，特地赶到上海，鼓励我继续办下去，对我说，凭他的嗅觉，这是一本很有前途的杂志，希望我能拿到江西南昌他们的出版社去出版。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支持，我也了解秋林社长有很深的人文情结，他读过不少社科人文书籍，一直希望能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。他又说，希望以《悦读》这本杂志书为契机，为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将来在人文图书出版方面的发展创造条件。

秋林社长是个雷厉风行的人，立即在上海为我安排办公室，帮我进行筹划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南昌好远好远，要到南昌去出版，有些“恐惧”。秋林社长笑了，他说其实南昌到上海还是挺方便的。说服我先在南昌排印三卷，待版式和流程定型后，再到上海排版印刷。这样，我第一次来到南昌孺子桥边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。

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到过很多出版社，可是一踏进二十一世纪出版社，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。这儿的职工都很朴实，在工作上尽心尽力，整个团队上下协调齐心。为我拼版的小章，无论我对版面有什么要求，她都能设法满足，有时我希望推倒重拼，她也从无怨言。加班加点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。到哪儿去找这样好的职工？第一卷出版后，我就决定今后继续拿到南昌来出版，这样既保证质量，工作也顺畅。从此每逢付印前我都会来一次南昌，就这样，至今《悦读》编了四十四卷，我就从上海至南昌来回四十四次。累计差不多在南昌住了一年时间。南昌真成为我的第二故乡。

在秋林社长的领导下，心情是很舒畅的。时间久了，我才体会到，为什么这个社有这样高的凝聚力。秋林社长处处为下面的人着想，第一卷出版时，他要把我的名字署在封面上，开始我不同意。我从不喜欢亮自己的名字，主持《文汇读书周报》十几年，我的名

字在这份报纸上亮得最少，还不及编辑部一位管杂事的干事。我对他说：还是写你的名字吧！但秋林执意要写我的名字。他说：“这样，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，我可以帮你顶！”一个“顶”字，使我十分感动。我在传媒干了几十年，从未听到一位领导说出了问题愿意为下面“顶”。在《文汇报》工作时，只记得报社的最高领导对我说过：“千万不能出问题啊，出了问题不仅你自己倒霉，还会连累报社，连累我们。”听得我脊骨都起了凉意。有一个愿意为部下“顶”的领导，下面怎么会不拼命干呢？难怪在这家出版社许多人都有一种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情结。与一些编辑和职工接触，我感受到秋林社长在群众中的威望。第一卷出版时，我提出了一个要求：制作一张带丝带的书签。后来制作部门来找我，说这书签要一张张手工做，很麻烦，时间这么仓促，要制作两万张，有困难。我撒了一个谎，对他说，这是社长的要求。那人听后说：“社长的要求，我们再困难也要完成！”转身就走。这张书签后来成了《悦读》的一道风景，由于美术编辑徐泓的精心设计，很受读者欢迎。文化老人杨苡多次到编辑部来索取。

秋林社长很善于组织各种营销活动，《悦读》创办后，他便提出要在北京、上海等地举办作者、读者座谈会。我讷于言辞，不善交际，对这类活动热情不高。一拖再拖，到出版第三十卷时，秋林社长说不能再拖了，一定要在北京开一个。没想到，开会的那天，北京一些著名的学者和出版人济济一堂，资中筠、陈铁健、蓝英年、王学泰、王得后、陈四益、董秀玉、汪家明……都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，表示“非常敬佩《悦读》这本杂志书的文化坚守”，并对秋林社长表示致敬，他们说，张社长的出版眼光和经营智慧都非常突出，如今能把一部分精力放在《悦读》上，是很难能可贵的。这些

专家学者过去对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并不了解，如今通过《悦读》，他们知道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出版社。——这也是秋林社长出版《悦读》的一个初衷，他希望通过《悦读》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在文化界发挥更大影响，为今后让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触角伸向更广领域创造条件。事实确也如此，后来一些著名的学者慕名而来，把自己的书稿送交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。

寒往暑来，《悦读》一卷卷地出版，不知不觉出版了四十余卷。

编完了第四十四卷《悦读》，在离开南昌的前一个晚上，我来到了秋林社长的办公室。这儿来过无数次了，这是我见过的最忙碌的办公室，只要秋林社长不外出，从早到晚，总是川流不息，或开会、或研究工作、或会客、或走进走出要求签署文件，即使在假期，也总能在这儿见到秋林社长的身影。从我第一次进这办公室，至今已有近十年了，外观没什么大变化，只是增添了不少奖杯、奖牌，以及中央首长视察的一些照片。那天晚上，我俩静静地坐着。窗外滕王阁斑斓的灯火，倒映在抚河中，显得变幻莫测，勾引起许多往事的回忆。我们曾在这儿商讨工作、促膝谈心、广议天下事，秋林社长甚至还给我谈起自己的隐私……想到再过半个月，他就要搬离这间办公室，我不免一丝怅意掠过心头。今后在这个办公室，再也没有这样谈话的机会了！或许秋林社长也有这样的同感，我们俩默默地相视无语，最后，说出了同一句话：我们都要好好保重！

还有半个月这间办公室就要更换主人了，心中不觉泛起一个问号，秋林社长在出版界出于其类、拔乎其萃，如果继续让他干下去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肯定能创造出更多的辉煌和奇迹。可是，我们的制度不允许他这样做。制度要求对业务干部也如同行政干部一样管理，三年一个任期，到年龄就退休。须知，有时一本好书要在市场

上闪闪发光，起码得三五载时间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为什么历久不衰，永葆青春？有人总结出两个原因：一是秋林社长个人的德才；二是因为他连续在这个社当了三十年社长，使社的发展得以有连续性。此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当我与秋林社长握手告别时，突然想到，制度不允许他再在这儿任社长，可是，对这样一个充满活力、积聚了三十年经验的出版社社长，制度能让他就此俯首回家养花弄草、颐养晚年了吗？难道他的活力和经验不会再去创造另一个奇迹？在这改革开放的年代，什么可能都存在。让我们拭目以待吧！



《悦读》第四十四卷“卷首语”

褚钰泉

什么样的文章称得上好文章？有人认为，获过奖、受到领导表扬的就是好文章。其实这看法并不完全。如今评奖名目繁多，日后检点一下，能有多少获奖的作品和获奖者，使人经久难忘？有些应景之作，时过境迁，没人再记得了。更有甚者，那些随波逐流、趋炎附势的文字，多年后再读，还会被人当作笑谈。真正的好文章、好著作，是要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。刚发表时，或许还有争议，还得承受种种压力，可是，岁月让它发出熠熠的光芒，读者的口碑使之长久留在我们的记忆中。

陈铁健先生的一些文章和著作就属于这样一类作品。本卷刊登的陈铁健先生学术素描，介绍他对瞿秋白等现代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研究，读者可从中体察到一位勇于探究、敢于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学者是如何艰辛和不易；没有对历史负责的精神，不敢于担当，怎能拨开迷雾见到云天！

人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：任何失忆的民族都是没有希望的民族。

忘掉自己的历史、对自己的历史充满误解，这于一个民族、国家是很可悲的。历史学家不能为读者讲述真实的历史，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过去，这是最大的失职。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一些禁锢的破除，人们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，愈来愈接近历史的本真。读者不由惊呼：原来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和事件，与我们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教科书上了解到的大相径庭。这是包括陈铁健先生在内的许许多多历史学者努力的成果，也是我们时代在进步的一个标记。

然而，这方面的任务还很艰巨，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人，他们还会掩盖真相，随意诠释，动辄给一些讲真话的文章和著作扣上帽子、贴上标签。其实这些人很愚蠢，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，谁又能阻挡得住呢？

